

語言學研究与批判

第一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語言學研究與批判

第一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語言學研究与批判

第一輯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門內承恩寺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4号)

京华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号 9010·6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6

字數 150,000 印數 0001—3,000 定價(7) 羊 0.65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前 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万馬奔騰的形势下，語言学正日益肩負起巨大的任务。但是，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資產階級語言学观点，却严重地阻碍着語言学的飞速发展。在我国語言学界，資產階級甚至封建地主階級的学术观点，其影响是极其严重的。解放以来，不少資產階級語言学者，在他們所写的新著或重版的旧著中，仍坚持其資產階級学术观点，公开地或者隱蔽地加以傳播。在黑云乱翻的1957年春，有人甚至狂妄地向馬克思主义的領導地位挑战，妄想把我国的語言学拉回資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不少資產階級語言学者，他們严重地脫离实际，在学术上宣揚所謂“为理論而理論”的道路，对西方資產階級学者充滿了奴隶性的崇拜。他們有不少著作是粗制濫造的；为了个人名利，对讀者缺乏起碼的責任感。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們不能沉默。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发揚了敢想、敢说、敢創造的共产主义风格，决心向語言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展开坚决的长期的斗争。拔白旗，插紅旗，大破大立，讓我們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在党的紅旗下，沿着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康庄大道飞速前进！——这就是我們的回答。

自今年7月以来，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在党领导下，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运动。广大的同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是这个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在破除了迷信以后，一批語言学界的新軍，正在战斗中迅速地成长。經過两周的苦战，語言專門化四年級同学，油印出版了《王力先生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专集二册。与此同时，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出

了一批批判高名凱等先生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和大字報。在形勢推動之下，老教師也相繼作了初步的學術思想的自我批判，並相互進行了一些批判。這本文集，就是我們上一階段運動的收穫之一。

我們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這只是邁開了第一步，今後自當繼續努力。本文集所收各稿，由於時間短促，粗糙的地方是有的，我們歡迎批評指教。但我們堅信，在黨的領導下，語言學界必將插遍紅旗，並出現一支強大的工人階級語言工作者的隊伍。

謹以此書，獻給我們偉大祖國的國慶九周年。

編者

1958年9月3日

目 录

前言.....(iii)

批判王力《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中的反

馬克思主义观点王晶湖 郭松泉 (1)

反对音韵学研究中的資产階級方向... 余光清 謝自立 郑华雄 (12)

批判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資产階級方向..... 溫端政 (33)

批判王力《汉语史稿》的体系及其治学方法

..... 集体討論 向熹 唐作藩 郭錫良 执笔 (37)

批判王力《汉语詩律学》..... 云景魁 張雪森 王笑湘 李懿华 (50)

批判王力在語法研究中的主觀唯心主义..... 季恒銓 (57)

对王力生硬搬用西洋語法体系崇拜資产階級語法理論的

批判..... 曹先擢 (69)

批判王力在語法体系問題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溫端政 (78)

王力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 熊正輝 (84)

批判王力的資产階級治学态度..... 溫清波 (92)

反对粗制濫造的写作态度.....

——評王力《广州話淺說》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話》 郑宝倩 溫端政 (105)

万恶不離其宗

——名利思想对学术研究危害之一例 余光清 (118)

批判高名凱为理論而理論的資产階級学术观点

..... 高学釗 赵世开 (122)

批判高名凱对待資产階級語言学說的錯誤态度..... 赵世开 (128)

从关于“社会方言”的两个举例看高名凱的資产階級学术

思想李兆同 叶蜚声 (133)

从《普通语言学》的语音部分来揭露和批判高名凯的资产

阶级学术思想甘世福 (139)

简评高名凯《普通语言学》“语义和词汇”编中表现的资产

阶级观点石安石 杨筱敏 (146)

一支打白旗的异军李行健 (160)

——简评陆宗达等《现代汉语语法》(上册)

揭露高名凯著作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根源岑麒祥 (168)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中所暴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高名凯 (174)

批判王力《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中的 反馬克思主义观点*

王晶湖 郭松泉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发表了王力先生的《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这篇文章相当全面地暴露了王力先生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王力先生在立場、观点、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原則性的錯誤。

一 理論与实践的統一問題

1. 王力先生輕視語言实践。他認為追究語言实践的人是“狹隘的功利主义”,是“急功近利”,并且說“問題越专门,越令人覺得缺乏实践意义”。不难看出,假使語言学沒有指导实践的意义,今天学习它还有什么意义呢?語言是人們每天都要使用的交际工具,可是語言学却是与实践沒有联系的东西,这是非常奇怪的結論。有不少語言学部門的工作都証明了語言学与实践是有密切联系的。比如学了現代汉语可以直接提高写作;学了方言学可以做方言普查;学了音韵学可以帮助学习和推广普通話等等,这些不都是很实际的工作嗎?王力先生不愿意看見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却反而說那些要求語言研究联系实际的人是功利主义。他甚至說:“如果为狹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語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按照王力先生的意見,要求理論联系实际的人倒要負中

國語言學落后的責任了。在這裡，我們與王力先生的意見有着根本的分歧。社會主義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急社會主義之功，近社會主義之利，有什麼不好呢？這不是什麼狹隘的功利主義，而是語言學應該發展的方向，是每一個語言學工作者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資產階級語言學者就是要使語言學脫離實際，把語言學弄成玄妙的東西，叫人見了害怕。他們認為這樣才算是科學。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怪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語言學必須聯繫實際，解決人民群眾所最需要解決的與語言有關的問題，與此背道而馳的論調或作法都是錯誤的。

2. 王力先生把語言的理論工作推崇到不應有的高度。理論是應該指導實踐的，但決不是說實踐是不重要的，而理論才是起決定作用的。王力先生對這個問題沒有作正面的回答，但他也仍然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只要有了三分學問，就可以解決實踐問題的十分之九”，“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的最后十里最艱難，而且最有價值。”這些話看起來好象也有道理，但與一貫輕視實踐的問題聯繫起來，仔細一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企圖以此證明理論是高於一切的，理論是最有價值的，至於實踐那算不了什麼。他甚至於把理論抬高到神秘化的地步，一般人根本不能了解，只有“那些懂得醫治奇難雜症”的人才能掌握。這種故作玄虛吓唬人的手法是許多資產階級學者一貫採用的。他們這種對理論與實踐的認識是直接與毛主席的《實踐論》的觀點相違背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認識來源於實踐，又對實踐起指導作用。語言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例外。語言學理論也應該是來源於實踐。但王力先生的主張却是從資產階級觀點出發，⁶⁶首先貶低實踐的作用，然後把理論與實踐割裂開來，最後把理論的作用抬高到不應有的高度。王力先生所以這樣做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理論不能指導實踐，為了不出丑，就把理論神秘

化起来,并且认为只有一般群众看不懂的东西才算是科学。其二,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学者的架子,好象作了理論联系实际的工作就有失学者的身分。

3. 王力先生提倡科学研究的盲目性。他說:“有許多人喜欢追問語言科学的实践意义,甚至死心塌地干这一行的人在研究某一个專門問題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被人家問起这么一个問題,也不免惘然不知所答。”又說:“我們只要肯定語言是值得研究的对象,那么,对語言任何方面的深入了解都是对語言科学有帮助的。”按照王力先生的見解,科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不必考慮为什么目的服务的問題。他認為科学研究并不是要解决什么实际問題,而是只要你对什么有兴趣就研究什么。我国語言学中問題很多,是不是什么問題都需要研究呢?我們認為,目前主要是研究、解决那些大的帶有关鍵性的問題,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关于文化革命的任务时給我們指出的,“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等等有明确目标的,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語言工作。那种沒有目的的科学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資產阶级的研究。王力先生自己正是这样,他之所以热衷于語言学,就是純粹从兴趣出发,他說:“我在解放以前,屢次向學生們說:‘語言学好比鴉片,你抽上了癮自然会喜欢它。’这样單純的把語言学看作趣味,和俞平伯先生把《紅樓夢》看做趣味,本質上是一样的。这样去研究就会过分強調分析看輕实践。”^①王力先生的这一段自我批判到現在仍然是适用的,王先生的脱离实际,过分強調理論的作用是站在資產阶级立場上来对待理論与实践的关系的。1954年王先生就沉痛地作了自我批判,但是1957年的王先生在观点、方法上絲毫沒有改变。这是值得王先生深思的。

① 王力《我从“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得到的一些体会》,《中國語文》1954年12月号。

二 关于“教条主义”問題

王力先生在文章里写道：“自从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出版以后，中国語言学界中存在着教条主义。”接着說他和某些人以前“搬那些洋教条并不能象搬斯大林的教条那样名正言順”。紧接着又說：“我們得承認，包括我个人在內，在过去五、六年間，我們在語言学領域中，往往免不了要犯教条主义，特別是在教學工作中，唯有教条最方便，也最安全。”讀了这段文字，讀者很自然地要提出两个問題：

1.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究竟是現代語言学理論还是教条？

2. 王先生是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在运用理論时犯了錯誤其責任由誰負？

本来这些問題都是不成問題的，但王力先生在文章中既然提出来了，就不能不加以討論。斯大林的这个著作发表已經八年了，它在苏联、中国的科学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科学界曾經根据这部經典著作做了許多批判与改造各种科学研究的工作，当然，首先是語言科学。这些暫且不談，只要看看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对我国語言学的实际影响，就可以駁倒王先生的这些看法。

大家知道，解放以前，西欧資產階級学者高本汉、馬伯乐、叶斯泊森等关于汉語和語法的理論，曾經成为旧中国語言学界的权威理論，而过去我国許多語言学家几乎都是在这种資產階級語言学理論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的。当时，外国人說“汉語沒有語法”，就有人承認汉語沒有語法；外国人說“汉語貧乏”，“汉語落后”，也就有人跟着瞎嚷。他們完全被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牽着鼻子走，外

國人对我們祖國語言的污蔑，他們不仅不反对，反而成为这些謬論的盲目崇拜者，完全成为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俘虜。当然，也有另一部分人曾經搜集了許多寶貴的材料，企圖为漢語歸納出一个科學的語法體系，但是由于他們根據的理論仍然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套，而用的方法又是資產階級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所以几十年来，始終沒有歸納出一个真正科學的能为大家接受的漢語語法體系。解放以后，由于我們党對語言學的重視和積極領導，1950年斯大林又发表了《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在短短的几年內，我國的語言學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王力先生說《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教條，那是毫無根據的，是一種污蔑。因為大家都知道，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一系列原理，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現在一切進步的語言學者都拿它作為自己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導原則，這難道還有疑問嗎？那么，究竟斯大林的理論怎樣幫助了我們呢？我們認為，一方面，它幫助我們批判了反動的或錯誤的語言學說。首先，它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了語言的社會性、語言的本質，徹底打倒了那種認為語言文字有階級性的謬論。其次，由于我國語言學的研究深受資產階級語言學說的影響，嚴重地妨礙了我國語言學健康地向前發展。斯大林的這個銳利的理論武器，就幫助我們批判了資產階級學者所捏造的“漢語沒有語法”，“漢語落后”等謬論，恢復了漢語應有的地位。第三，它再一次指出科學必須與各種反動的或錯誤的傾向作堅決鬥爭，才能得到迅速的發展，告訴我們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摧毀一切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語言學說，更在積極的方面給我們以巨大的幫助，使得我國語言學迅速的開始擺脫了資產階級的方向，使我們有可能把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学建立在新的科学基础上。它幫助我們建立了關於普通話、漢字改革的理論。它也大大地推動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及

其創立文字的工作。另外，关于語言学的任务的学說也使我們在研究工作中少走了許多弯路等等。难道这些工作不是在斯大林的理論指导下进行的嗎？这些明显的事实，难道作为科学院学部委員的王力先生看不見嗎？王力先生之所以要否定斯大林的語言学說，咒罵它是教条主义，就因为他是从資產階級立場出发，企图頑固地抱住資產階級那一套不肯抛弃；就是想以資產階級那一套虛偽的科学，来扯住剛剛走上馬克思主义道路的中国語言学的后腿，并且企图对它加以改造。不难看出，問題不在于《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个别論点是不是值得討論，而在于王力先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著作，在于他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經驗都当做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①从而使他自己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

从王力先生的言理和行动来看，他对待馬克思主义及其語言科学的態度是极不严肃的。王力先生解放后写的文章不少，也引用了不少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但其目的却在于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吓唬人，并以此来掩盖他自己的資產階級观点的本質。这也就是說，每当王力先生写文章、做演說的时候，为了使自己在群众面前說得“名正言順”，为了自己的方便，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搬起“斯大林的教条”来吓唬別人，抬高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社会里，王力先生居然說：不搬教条，自身的“安全”就成了問題。王力先生的所謂安全的問題，說穿了就是：一方面，他害怕更多的暴露自己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观点而挨批判；另一方面，又要以权威学者的观点来代替他自己的見解，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欺騙別人。同样严重的是，他把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和資產階級語言学說統称为教条主义。王先生認為它們之間的不同点，仅仅

^① 周总理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人代会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于“搬那些洋教条并不能象搬斯大林的教条那样名正言顺”。很明显，王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and 资产阶级的语言学两种根本对立的東西混淆起来，不分是非。第二，把某些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說的时候犯的錯誤，推到理論本身上去。我們的看法与王先生相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問題》絕不是什么教条，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闡明的現代语言学的理論。至于资产阶级语言学，从根本上說来是我們所不需要的。談到运用理論时犯了錯誤其責任由誰負的时候，我們的看法也与王先生相反，我們認為向苏联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得不好，責任完全在于我們”^①，而与理論本身沒有关系。

三 关于“发揚优良傳統”和“赶上世界語言科学先进水平”的問題

王力先生在文章里說：“老一套的語文学和新一套的语言学是脫节的。語文学的偉大成就在历史方面，特别是上古汉语方面，而某些青年語言工作者对于老一套是望而生畏的。这样，在语言学的发展前途上就隱藏着一个危机。一方面，就西洋傳來的一套語言学來說，我們是那样落后；另一方面，对于我們祖先的优良傳統，我們又不愿意繼承，我們拿什么去赶上世界語言学的先进水平呢？”又說：“我們的前輩还有值得我們学习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什么是古人的朴学精神呢？按照王力先生的意見，朴学的精神就是“为了一个字的語源所写的文章，所費的时间往往和現代人写半部书的时间相等。他們想好一个問題还不輕易下笔，写好了

^① 周总理 1957年 6月 26日在人大常委会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部书还不輕易刊行。”很自然，按照王先生的邏輯，要消除我國語言學發展前途上的這個危機，就必須解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為了使我國語言學不“那樣落后”，就必須向“西洋傳來的一套語言學”學習；第二，為了克服“我們又不願意繼承”傳統的“危險”傾向，必須向古人學習，特別是學習古人的“朴學精神”。在這裡，說穿了就是王力先生替語言工作者豎起了兩面白旗來與無產階級的紅旗相抗衡。一面是資產階級的黑旗，即他說的所謂西洋普通語言學。另一面是封建主義的黑旗，即他說的所謂傳統和朴學精神。王先生公開號召語言工作者拋棄無產階級的紅旗，而站到他的黑旗下面去，他並且極力鼓勵語言工作者在他的黑旗引導下去趕上“世界語言科學的先進水平”。這種主張不僅是反動的，而且對於今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鬧文化革命和科學研究也是極為有害的。至於談到傳統，究竟什麼是傳統？用什麼觀點、方法來繼承古人的傳統，我們繼承古人傳統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我們在繼承傳統的時候應該通過什麼樣的途徑？這些比單純說要繼承傳統更為重要的問題，在王力先生的文章里也是找不到答案的。我們按照王力先生的所謂朴學精神，“想好了一個問題還不輕易下筆，写好了一部書還不輕易刊行，”“為了一個字的語源所寫的文章，所費的時間往往和現代人寫半部書的時間相等”的方法，能不能使我國的語言學多快好省地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呢？肯定說是達不到這個目的的。硬要把這種早已過了時的方法叫青年人去效法，只能阻礙科學迅速發展，只會束縛青年們大胆創造的革新精神，只會使得語言學界仍然是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很明顯，王力先生和其他資產階級學者一樣，打着要繼承傳統的幌子，一味地在宣傳厚古薄今，要青年語言工作者脫離社會現實生活，脫離人民群眾，逃避階級鬥爭，而鉆到上古漢語的故紙堆里去繼承傳統，要求社會主義時代的青年人去為死人服務，而不是厚今薄古，古為今用，面對現實，從解

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問題出发，去研究某些必要的古籍資料。今天看来，这种主張对于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破坏性也就更加明显，我們必須坚决反对。也許有人会問，王力先生提倡的朴学精神是叫人做學問时謹慎从事呀，我們說，看起来，王力先生是很向往那种做學問的朴学精神的，按理講，他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很謹慎的，他的著作也应该是錯誤比較少的，然而从双反运动以来所暴露的一系列的事实却对这种說法作了无情的諷刺。我們也应该說明，我們决不是否定真正的傳統，然而我們对資產階級學者故弄玄虛，以及他們所宣傳的假傳統却一定要揭穿，因为它只不过是一套騙人、害人的鬼把戏罢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貨色。我們的科学研究一定要有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問題的明确目的，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綫而不是专家路綫，才是正确的方向。那种脫离實踐，脫离人民群众的科學，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

至于为了使我国語言学不“那么落后”，就必须学习“西洋傳來的那一套語言学”，作为消除我国語言学发展前途的“危机”的主張，更是荒謬。在这里，王力先生把問題根本搞錯了。假若硬要說語言学界存在什麼“危机”的話，就只能說不少語言學家的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和学术思想太濃厚，其次是語言学工作者的革命干劲太差，特別是語言学界又紅又专的干部太少：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王先生在談到克服我国語言学发展前途上的危机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对在一切工作中起統帥作用、作为一切工作的靈魂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只字未提，这是資產階級學者輕視和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思想的自然流露，这也是和王先生把《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当作教条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很明显，要迅速发展我国語言学，但又取消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指导，这样，我

國語言學將走上什麼樣的道路，那是很明白的。

四 其他問題

除了以上幾個大的問題以外，王力先生在另外一些問題上的錯誤，也是很嚴重的。他一方面，對我國語言學的成績估計過低；另一方面，卻無原則地替西洋普通語言學大肆吹捧。他說：“就中國的語言學來說，卻又比歐洲的語言學落後了七八十年”，“如果我們不承認中國語言學的落後，我們就是沒有自知之明。”又說：“假使西洋沒有歷史研究，也就沒有今天的普通語言學”，“最近五十年来，中國語言學各部門如果有了一點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語言學的恩賜”。並且強調說“中國語言學的落後，主要是由於我國普通語言學的落後”。我們認為，王力先生的這些看法，代表了語言學界中一部分人的意見，應該展開辯論，這對於破除對外國的迷信，解放思想大有好處。如果說中國語言學，在解放前比西洋落後，那是事實。但是，在解放後，由於黨對語言學的重視和關懷，特別是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和《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出版，就使得我國語言學的發展迅速的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幾年來，我國語言學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成績是西洋資產階級語言學不可比擬也不能比擬的。假如王先生說的中國語言學的落後，是指我國語言學個別部門，那沒有什麼不對，但他明明指的是整個中國語言學。我們認為，這應該具體地歷史地分析，特別是不能離開階級觀點，普通語言學在整個語言學當中的地位不容忽視，但它對語言學的指導作用，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理論部分。西洋的語言學不過是收集的材料多一些，研究的範圍比我們大一些罷了，至於立場、觀點、方法則比我們整整落後了一個時代。此外，王力先生還對我國人民使用的書面語也加以詆毀，他